

>>>本期关键词:诚信

撒谎成性误大事

曾庆平

到目前为止,科学家还没有鉴定出“撒谎基因”,对于撒谎是先天遗传的特征还是后天养成的习惯尚无定论。不过,我宁愿相信撒谎是人的天性,没有种族和性别之分,这样所谓“中国人爱撒谎”和“男人喜欢撒谎”的说法就不成立了。

相对于撒谎而言,我更相信诚信是通过后天的教育养成的一种美德,而中国人并不缺少这种美德。中国历来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箴言。孔子说:“人无信不立。”孟子也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因此,崇尚诚信,自古有之,只不过诚信仍属于道德的范畴,必须有适当的行为约束才能让人遵守。

我在西方国家跟人打交道时,总感觉老外是“一根筋”,遇事不懂得变通。相反,中国人“八面玲珑”,无所不用其极。其实,老外并非真的木讷,而是他们从未想过要撒谎,因为不诚信的代价是惨重的!相反,中国人撒谎之所以成为家常便饭,是因为“吹牛不犯法,撒谎不治罪”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中国社会,有哪个撒谎者吃不开?倒是那些不撒谎的“老实人”常常“吃亏”。

中国人不认可“恶作剧”的撒谎,但却提倡“善意”的撒谎。小学课本上那个喊“狼来了”的小孩成为恶作剧的牺牲品,被认为是罪有应得,而“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反而被认为是人际交往中的智慧。姑且不论善意撒谎对不对,如果一个人从小就习惯了撒谎,那他无论如何都是不会停止撒谎的!

国外杂志在发表文章时,一律要求作者过目并批准,有的杂志还要求所有作者一一签名,还有的杂志要求写明每位作者对文章的贡献,这就是一种行为约束。按理应该如实禀报,但有些人会觉得多此一举,往往通讯作者只是知会一下其他作者,甚至不让他们知道,不然哪会爆出院士在造假文章中“被挂名”的丑闻?试问还有多少未“出事”的论文“挂名作者”默认自己“被挂名”呢?

中国人制造假药那是世界一流!衣食住行,无一不能造假!“三聚氰胺”风波刚过,“5元葡萄酒”作坊才被曝光,“皮革奶”又上市了,弄得港澳奶粉因内地游客疯狂抢购而脱销,不得不出台限购政策!这些造假行为由于危及人身安全而被定义为恶作剧的撒谎,它们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抬高自己的政绩,不惜伪造GDP数据;一些大学为了提升学校的声誉,不惜集体作弊,虚报、谎报院士候选人的材料。当这些行为曝光后,不仅不见人们谴责,反而受到大众原谅,因为它们被定义为善意的撒谎!

恶作剧的撒谎固然可恨,难道善意的撒谎就能容忍吗?究其根源,中国人爱撒谎的习惯是从小养成的,而长大后的社会环境对不守信用的行为缺乏规避机制和惩罚措施,更助长了造假、欺骗等恶习横行。如果中国社会的大环境不来个彻底的“正本清源”,撒谎终将犹如“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http://blog.sciencenet.cn/u/qzpeng)



图片来源: http://salazarfalcon.deviantart.com/art/pinky-swear-104356676

诚信缺失:学术不端的深层根源

唐凌峰

学术不端指的是在学术研究中违背科学共同体公认的行为规范而作出的种种不良行为。具体来说包括:抄袭、剽窃、夸大和窃取学术荣誉,强行在他人成果上署名,捏造、修改和选择性发表论文数据等等。随着一宗接一宗的学术不端事件东窗事发,近年来学术不端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学术不端已成为科学界和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无法回避和不得不重视的问题。在医学上治疗一种疾病讲究“对因治疗”为主。那么,学术不端的“病因”,也就是根源是什么呢?对此,我的认识经历过三个阶段。

一开始,我自然地把学术不端的根源归结为科研人员科研道德的低下及科学精神的缺乏。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如果换成是我,我是绝对不会做出学术不端的事情来的。但是后来我认识到,一、别人不可能都像我一样;二、虽然我不会,但将来也许会由于种种原因也做出学术不端的事情来。显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然,科研工作者的科研道德水平及科学精神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然后,我又进一步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所

谓好的制度会使坏人无法做坏事,而坏的制度会使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如今我国的科研评价体制存在过度量化的问题,往往把发表论文,包括国内的、国外的、SCI的,以及出版专著的数量作为评价一位科研工作者学术成果的最主要形式。这就一方面促进了只重数量、不顾质量的垃圾论文的产生,另一方面,为了多发文章,也促进了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而且科研评价体制还存在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问题。目前普遍实行的是年度考核一次的做法,而众所周知,科学研究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要想取得原创性的、有突破性的成果,就要冒着失败的风险,潜心进行长期的研究,一年的时间是不可能做到的。过于频繁的考核使科研工作者不能潜心研究,不再选择有创新因而也是风险大的研究课题,转而进行“短平快”,易于短期内发表论文的研究项目。这无疑大大促进了学术浮躁之风。一年之内没有足够的论文怎么办?有些自身科研道德素质不高者,则会利用造假等行为来伪造论文充数。总的来说,在科研评价体系方面,量化考核促进了垃圾论文的产生,考核

周期过于频繁,则促进了学术浮躁,这两方面都促进了弄虚作假的学术不端行为。

但是,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外界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种种社会属性。科研机构也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作为社会的组成之一,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的影响。所以,更进一步分析,社会根源才是产生学术不端的深层次根源。更具体地说,弄虚作假、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社会根源是产生学术不端的深层次根源。

现在的社会风气,形式主义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它存在于各行各业,政治、商业、媒体以及其他一切行业,反映的是国人集体的道德滑坡。这样的社会风气,会形成以下几种效应:

一是责任分担效应。比如上课,如果只有一个学生迟到,那他定会觉得自己心里不安,而如果有一大批学生都迟到,只要他不是最后的一个,他心里的不安就会少得多。因为,迟到这种错误行为的责任,已经分摊到许多人头上,每个人所要承受的责任就很小了。同样,舞弊是学校所严令

远逝的尊严

李侠

名史册的是他与楚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宋襄公浪费了3次可以扭转战局的机会,成为了千古的笑话。问题是解读历史是否只有一种视角,这个问题很多年前我就思考了许久,可是一直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

导致宋襄公失败的主要理念是“仁义”,所以任何一个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机会都被宋襄公认为是非仁义的,故而放弃,所以战争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考虑到我们今天遭遇到的无序的市场经济以及普遍的诚信缺失状况,那么重新思考宋襄公的故事多少还是有些意义的。

宋襄公不肯袭击尚在河中的敌人,以及队形混乱立足未稳的敌人,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行动是不仁义的,军人之间的战斗只有在双方准备好的情况下进行才是合理的。这些想法固然迂腐,但是它却体现了一种做人的尊严,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的人都太聪明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考虑一切手段,尊严在这种追求功利的

思想引导下缺席了。所以,我们看到了背信弃义、出卖,看到了群体精神的萎靡,为了钱或者别的利益,我们可以放弃做人的一切规定,从这意义上说,春秋战国以后,我们已经把人的尊严的底线无限下降,以至于今天我们都不敢承认或者相信尊严的存在。中国文化的没落应该从这时算起。放眼四周,我们看到了假乞丐的快乐乞讨、看到了群体出卖良心、看到了富人的见利忘义等等,以至于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人是一个喜欢撒谎的民族。

在这个匆忙逐利的年代,宋襄公的故事至少还能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祖先也曾经光明磊落地生活过,虽然这些人都失败了,但是他们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尊严是无价的。在世无良盗的今天,想象一下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丢失的品格应该是一个民族必要的反思。也许宋襄公不适合做一个统帅,但是他绝对适合做一个讲究诚信的公民或者军人。而当下我们最缺少的就

禁止的。但有些课程,比如选修课,或者政治课,由于几乎大部分的学生都舞弊,所以,大家渐渐觉得理所当然。而如果绝大部分学生都没有舞弊,例如高考或是其他的考试,某些极少数人舞弊,他们就要承受着更大的来自外界和内心的道德谴责。同理,当诚信缺失成为一种社会的普遍现象,各行各业,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地进行或习惯于弄虚作假,那么,每个人所承受的内心或外界的道德谴责也就微乎其微了。

二是法不责众效应。所有的社会惩罚机制最终的目的只是惩罚少数,而不是惩罚大多数。如果大部分人都弄虚作假,而且这其中甚至可能包括他们的领导、上级、监督者,可以想象,一个本身弄虚作假的领导又怎会下大力气去惩罚一个同他一样的下级呢?就算领导本身严于律己、实事求是,可是,如果大多数的下级都弄虚作假,他要么只能选择其中的极少数,杀一儆百,要么就是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而且后一种可能性要远大于前者。

三是逆淘汰效应。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所谓“顺时者昌,逆时者亡”。那些弄虚作假者,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与其他人竞争,实质上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因而在竞争中胜出,掌握了更多的资源、更高的社会地位,甚至获得了评价他人优劣和决定他人命运的权利。很显然,“人以群分”,他是不可能奖励、提拔、重用那些不弄虚作假者的,原因一是人以群分,原因二是别人的纯洁会给他以道德上的压力。当整个社会大部分人如此时,就形成了一种逆向淘汰的机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表现在科学界,就是那些踏踏实实做科研者难以获得科研资助、学术职务,相反,进行学术不端者,只要他不是太明目张胆,不是太倒霉,没有被发现,就能名利双收,获得更多的资源和学术地位。毫无疑问,这样的一种淘汰机制是极其不利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

我常常想,那些被揭发出来的学术不端者,他们现在过得怎样?他们有没有承受外界舆论的压力和来自自己内心良心的不安?如果他还会受到外界(指他周围的环境,如他的同事、学生等)的舆论压力,那说明我们的社会还能分清是非黑白;如果没有,说明我们的社会真是到了“举世皆浊”或者大部分人都已经麻木的地步了。如果他自己还能感觉到良心上的不安,那说明他还没有完全丧失良知;如果没有,那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此人已经修炼到恬不知耻的地步了,二是他认为周围的人同他一样,只不过他倒霉一些被发现罢了。

在西方有一种流行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真心希望我们的知识分子能够成为社会的良心,即使在举世皆浊的环境下,他们一样能够独善其身。

(参考文献:略。此文写于2007年。)(http://blog.sciencenet.cn/u/lingfeng)

诚信与欺诈并重的国度如之奈何

周可真

文所述,我终于感悟到:当今国人之聪明,实堪称是前无古人,周无外人,唯此为最!

国人之聪明,是聪明在心中毫无诚信观念,行为上只有待人的虚伪礼节——所以然者,也仅仅是为了避免宋襄公那样的败局,倘无外在压力,没有外界舆论制约与实在的外来威胁,则可能连虚伪礼节都不会顾及。

如今国人之心中念念在兹者,归结起来,一个字:“成”。两个字:“成功”。三个字:“不失败”。所以然者,因其坚信:“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为了“成”而不“败”,国人都是大丈夫气概,“大丈夫能屈能伸”——“屈”则虚伪守信,“伸”则无法无天。在这世上无与论比的灵活屈伸运动中,诚信和欺诈是一回事,都是达到“成”而不“败”的工具,只要达到目的,无论是诚信还是欺诈都是“好猫”。

诚信与欺诈同样重要,这就是国人的成功之道或成功之要诀。据此,若要说国人全然无诚信,这肯定是不对的,它就像说国人全然无欺诈一样荒唐。这里的问题完全不在于究竟有无诚信或有无欺诈,而在于何时用诚信,何时用欺诈。在这问题上,国人最信刘备“随机应变信如神”的那一套,最善于权宜行事:时宜于诚信,则用诚信;时宜于欺诈,则用欺诈。这个“时宜”是什么?“时”是

决定成败的外部条件;“宜”是适于成功的外部条件。“权宜”的“权”,就是对其外部条件进行权衡、裁量,看其是否合乎自己成功的目的。这里“权”的标准唯在于这个自私的功利目的。

权宜行事的思想实质就是在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一切行为规则都是自为的,都由我决定,以我的需要为转移。在这种唯我主义的规则意识中,规则及其标准是完全不确定的,故在这种意识的实践形态中,实践者所坚持的,甚至不是一般的多重行为标准,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无限重行为标准,其外部条件变化有多快,其行为标准的变化就有多快。按照这种行为规则观念,什么公共理性,什么公共规则,都完全谈不上。

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者,是完全没有公共理性的,因而也完全不知公共规则为何。当其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系统中时,他们也必然要面临要求其应当或必须予以遵守的公共规则,但是面对这种规则,他们所考虑的不是怎样按其规则行事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是考虑如何摆脱其规则的制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如此就形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春秋末

年的老子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任何一个统治者,无论他有多么聪明,其一个人的智慧必然胜不过万众的智慧,因此,统治者凭其个人智慧而想出的任何一种治国良策,只要其一出台,立马就会出现无数对付和化解其国策的民间良策,这就是所谓“智慧出,有大伪”。“智慧”是指出于统治者个人智慧的治国良策,“大伪”是指出于众人智慧而能够化解其国策的民间良策,这些民间良策都是对国策阳奉而阴违的办法,故而谓之“伪”。正因为如此,老子主张“大智若愚”,即统治者根本不应该利用个人智慧来治其国,而是应该看到自己智慧的极其有限性,从而放弃“以智治国”的“妄想”,任百姓之自然,无为而治之。

实话实说,即便智慧高超如老子者,他也完全想不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来对付这般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国民,而只是想出了一个为任何统治者都无法加以实施的“无为而治”的玄道之法,这个办法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傻主意”,全无实用价值。

认真研究过《老子》又对国民性有精深理解的韩非,终于想出了一个用以对付极端利己主义者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治国办法,这种集“法”、“术”、“势”为一体的治国办法,其思想实质就是要造就一个极端利己主义的国君来对付极端利

己主义的国民。这个办法得到了秦始皇的赏识,觉得它很有实用价值,因为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实际上就是采取了与此类似的治国方略,并且事实证明,这种体现法家思想的治国方略是颇具成效的,它使秦国从一个起家于三流之国(大夫之国)而后为平庸的二流之国(诸侯之国),迅速发展成为诸侯中的一流强国。正是秦国的这发达速史,使秦始皇十分赏识韩非的治国方略。事实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是按韩非治国方略的基本精神来强化集权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而且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末而未有根本性改变。

中国的历史实际上已经证明,对付极端利己主义的国民最有效的治国之法,就是能造就极端利己主义国君的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只是中国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民主潮流席卷全球,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是不能再搞了,但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国民却依然如故,这可怎么办呢?

中国啊中国,怎么办?有谁能不靠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而又能治理好这个充满了极端利己主义者的国度呢?

(http://blog.sciencenet.cn/u/周可真)